

尘封的绝响

钟离国钟磬乐器研究

李清 杨和平 李敬民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本项目研究获教育部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760039)
和蚌埠学院2012年淮河文化研究专项基金资助

➔ 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文库
蚌埠市淮河文化研究会

尘封的绝响

钟离国钟磬乐器研究

李清 杨和平 李敬民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封的绝响：钟离国钟磬乐器研究 / 李清, 杨和平, 李敬民著.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4
(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蚌埠市淮河文化研究会研究文库)
ISBN 978-7-5672-0491-1

I. ①尘… II. ①李… ②杨… ③李… III. ①编磬—古乐器—研究—凤阳县 IV. ①K87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0281 号

尘封的绝响

——钟离国钟磬乐器研究

李 清 杨和平 李敬民 著

责任编辑 刘诗能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215006)

苏州市深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青花路 6 号 2 号厂房 邮编：215151)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92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0491-1 定价：7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由蚌埠学院李清老师、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老师、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李敬民老师撰著的《尘封的绝响——钟离国钟磬乐器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此书研究的青铜编钟和石磬均为我近几年领队主持的考古所获,也是我们邀请该课题组老师们主持研究的项目之一。该课题组治学严谨,自接受对钟离国墓葬出土编钟、石磬测音研究项目以来,虚心求教,一门心思地进行策划组织,安排相关专家参与,可谓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最终撰著成书。这是该课题组刻苦钻研和辛勤劳动的结晶,精神可嘉,值得学习借鉴。他们要我为该书写序,实不敢当,因为我对音乐是门外汉,又不能推脱掉我们之间在协作科研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在此罗列一些相关文字也补此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安徽省舒城九里墩、凤阳大东关和卞庄、蚌埠双墩等地先后发现与考古发掘钟离国王陵或贵族墓葬五座,这是安徽周代诸侯国考古最重要的新发现。1980 年发掘的舒城九里墩墓依据其青铜器特征和“钟离公鱼”、“蔡侯戈”等铭文,对该墓葬的属性有:钟离国墓、群舒墓、蔡侯墓、楚墓等不同之说;1991 年和 2007 年凤阳钟离古城西侧大东关墓 M1 和古城北侧卞庄墓 M1 出土器物相同,卞庄墓出土 5 件青铜镈钟上发现“孙钟离柏之季子康”等铭文。由此,凤阳大东关 M1 与卞庄 M1 均为钟离国王陵或贵族墓葬。蚌埠双墩村有两座高大封土堆墓葬,通过 2006 年至 2008 年对一号墓的发掘,其墓坑结构为特殊圆形,还发现许多从未见过的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彩陶器等文物,在 9 件钮钟和簠等青铜器上均发现有“钟离君柏”等铭文,该墓葬为钟离国一座王陵,被评为 2008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批钟离国墓葬的发现和发掘首次以实物

证明文献中有关钟离记载的事实,为研究周代列国历史和钟离国历史以及淮夷文化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学科研资料。

目前经考古发现和发掘的五座钟离国墓葬除蚌埠双墩村二号墓未发掘外,其余四座墓葬考古材料均分别得到及时的整理研究并发表或出版了成果报告、简报等。如:《凤阳大东关与卞庄》,科学出版社2010年;《安徽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成果重大》,《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9日第4版专刊;《春秋钟离国墓的发掘收获》,《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钟离君柏墓》书稿已交付文物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等等。

钟离国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具有时代和个性特征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等器物群,特别是乐器青铜编钟、石磬在每一座墓葬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出土,其中凤阳大东关 M1、卞庄 M1 和蚌埠双墩 M1 三座墓葬就出土青铜钮钟 3 套、甬钟 2 套和石磬 3 套。我们在对蚌埠双墩墓 M1 发掘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中,对钟离国三座墓葬出土乐器提出并进行了协作测音研究(九里墩墓葬被盗出土 1 件甬钟此次未测音)。这批钟离国青铜编钟和石磬乐器的出土引起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尤其是音乐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研究。如:刘信芳、阚绪杭等《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甬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 年第 3 期;缪鹏《钟离国青铜器初步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等等。

这次钟离国墓葬出土编钟和石磬测音研究是安徽省至今对古代编钟、石磬乐器进行的最为深入、系统、规模最大的科研工作之一。通过对凤阳大东关 M1、卞庄 M1 和蚌埠双墩 M1 三座墓葬出土 5 套青铜编钟和 3 套石磬测音研究,除了具有一些个性的双音节外,证明地处淮河中游地区的钟离国,所出土的青铜编钟和东南方的徐、邾、吴、楚、曾等国墓葬出土的青铜编钟音阶雷同,特别是具有楚国出土青铜编钟乐器的音韵风格。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逐步东渐进入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国最终沦为楚国属地,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楚国墓葬考古资料极为丰富,出土青铜编钟



乐器也非常之多,其精进的铸造、优越的性能、宏大的规模等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钟离国编钟乐器的测音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个地区和钟离国音乐学的空白,基本弄清其音阶的属性,丰富和拓展了钟离国与东南方诸国文化之间关系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根据有关资料,东南方诸国青铜编钟自身的发展是随着历史进程而演变成熟和衰亡。以典型的楚国青铜编钟为例,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中期的楚国编钟的基本形制、纹饰风格、组合、铭文以及音乐性能方面均与中原编钟大体一致。春秋中期至战国初的楚国编钟的体形和纹饰、铭文字体已具有新的风格,由过渡形转变为成熟形。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楚国编钟有所变化,形体修长、于口弧大的特点显现,铸刻铭文的现象已不再风行,铭文虽内容多样,但形式单一。由此,楚国乐器编钟从发生发展到鼎盛后而衰亡均与国之兴衰和社会的发展相伴始终。楚国编钟与中原编钟在钟体发音相关的结构和类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而钟体纹饰母题及风格、钟铭字体、音列设置、组合形式、在墓葬中的摆放乃至用乐规范等又有所不同。

钟离国三座墓葬出土编磬3套,但因残断或不全而失音,难以通过测音研究来复原其音阶组合,未能解决其规律性和音韵特征。这批石磬利用形体的大小长短厚薄和角度等来进行调音的制作技术手法明显,还有龙首形个性特征的组合编磬等。

根据有关资料,石磬早在龙山时代的许多地方就已同时出现,蕴含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色彩。起初石磬不是统治者宴享的乐器,例如《墨子·非乐》云:“(夏)启乃遥溢,唐乐于野,欲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由此可知,石磬既是祭祀用器,也是指挥作战的特殊工具,是“王权”的象征。甲骨文中,“磬”字形象是一人站立作槌击悬石之状。磬乐是祭祀、大飨食等大型典仪不可或缺的声音,且有极强的等级意义。在夏商周三代,不仅设有专职的乐官,还设有专门的磬师。龙山文化时期的石磬都是以单件形式出现的,学术界将这种没有成组成编的磬称为特磬。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成编的磬乐(编曲磬)大约到商代晚期才开始出现。

衷心祝贺该课题组这本专著的出版,愿该课题组的老师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在音乐考古测音研究方面深入开拓,不断取得新成果。

殷绪杭

2012年11月24日于合肥



目 录

序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钟离国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 / 11

● 第一节 钟离国的自然景观 / 12

● 第二节 钟离国的文化景观 / 17

第二章 钟离国的历史脉络与研究叙事 / 25

● 第一节 钟离国的历史脉络 / 25

● 第二节 钟离国的研究叙事 / 30

第三章 大东关一号墓出土钟磬乐器形制与科学测音 / 38

● 第一节 大东关一号墓简述 / 38

● 第二节 大东关一号墓出土编铎钟形制与科学测音 / 39

● 第三节 大东关一号墓出土编钮钟形制与科学测音 / 46

● 第四节 大东关一号墓出土编铎钟、编钮钟拓片 / 55

● 第五节 大东关一号墓出土编磬形制与科学测量 / 70

● 第六节 小结 / 71

第四章 卞庄一号墓出土钟磬乐器形制与科学测音 / 73

● 第一节 卞庄一号墓简述 / 73

● 第二节 卞庄一号墓出土编铎钟形制与科学测音 / 74

● 第三节 卞庄一号墓出土编钮钟形制与科学测音 / 86

● 第四节 卞庄一号墓出土编镈钟、编钮钟拓片 / 96

● 第五节 卞庄一号墓出土编磬形制与科学测音 / 105

● 第六节 小结 / 110

第五章 双墩一号墓出土钟磬乐器形制与科学测音 / 112

● 第一节 双墩一号墓简述 / 112

● 第二节 双墩一号墓出土编钮钟形制与科学测音 / 113

● 第三节 双墩一号墓出土编钮钟拓片 / 122

● 第四节 双墩一号墓出土编磬形制与科学测音 / 130

● 第五节 小结 / 137

第六章 出土钟离国钟磬乐器的价值追问 / 139

● 第一节 出土钟离国钟磬乐器的音乐学价值 / 139

● 第二节 出土钟离国钟磬乐器的科学研究价值 / 144

● 第三节 出土钟离国钟磬乐器的历史学价值 / 145

● 第四节 出土钟离国钟磬乐器的经济文化价值 / 146

参考文献 / 148

附录 / 153

后记 / 198



绪 论

一、关于钟离国

钟离国是史籍中记载甚少的先秦小国。《史记·秦本记》称钟离为“终黎”，与秦国同为嬴姓，后受分封而以国为姓。根据史料推测，钟离氏源自山东，后迁至安徽蚌埠和风阳一带。钟离国是淮河中游的一个重要方国，观其地望，是淮左通向淮右的重要据点，因而一直受吴、楚两个大国的争夺和挟持，最终成为大国兼并战争的“牺牲品”。20世纪80年代以后，安徽省舒城九里墩、凤阳大东关与卞庄、蚌埠双墩三地先后发现5座春秋时期钟离国墓葬，安徽凤阳县临淮关镇东发现钟离国古城遗址，成为考证春秋钟离国有力的证据，佐证了《左传》中有关钟离国有限的文献记载。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鲁成公“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公元前538年冬，“楚箴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公元前518年钟离被吴王僚所灭。由此可见的钟离国历史，前后约有58年。

钟离国地处淮河中游，《左传》中有关记载大都是在提到某项重要事件时将其顺带上，并没有反映其真实的历史，其实际建国的时间可能比《左传》中记载的要早。

二、关于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①

钟在辽阔的中国大地无处不在。钟声，从远古一直响到今天，悦耳悠

^①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译》第1页，岳麓书社，2000年。

扬,沁人心脾。然而,古人是由万能的自然中的什么启迪而制造出“钟”这一器物,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特定的器物,并对其进行概括和界定的呢?今天,要解开这样一个千古文化之谜,我们仅能依据祖先给我们遗留的文献和实物来进行诠释和阐述,凭借遗留实物来考证和印证了。

钟,一种中空的、由外部发力撞击能发声响的容器,由角、竹、木、陶瓷等所制,然而最多见的则是铜质和铁质。

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青铜编钟使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炼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中国编钟独特的合瓦形钟体结构和一钟双音的现象,显示了我国古代“金石之乐”的高超水平。

在中国古代,钟用于祭祀或宴乐,当木槌撞击钟发出声音时,它唤起的是人们对事件的重视和心灵深处的祈望。在我们祖先创造的璀璨的古代文明里,钟不仅成为了人类精神领域内有形、有义且有声的物质存在,而且成为了人与自然、与神祇、与宇宙进行无限对话的工具。自从钟及钟声诞生后,它便伴随着人类由远古走到了今天的文明时代。人类对那悠扬钟声的依赖心理,便也从此在心灵深处,一天天、一年年地沉淀。终于,人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这便是铸钟、敲钟,敲钟、再铸钟的往复。从此,这个民族成为了钟的王国。那悠扬的钟声,让人们沉浸其中,钟声不仅能与人的心灵对话,而且和宇宙产生着共鸣^①。

钟的原始创造,段玉裁先生写得非常清楚,是来源于“秋分之音”^②。

由此可见,“钟”及钟声是祖先依时令所发之声而受启发得来。对钟的追求,当然是以自然、悦耳为标准。这也是钟最终成为人们观念中圣器、宗教中法器的必然。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祈望有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能与巨大的自然对话,与茫茫的宇宙和星空对话,与心灵深处的巨大恐惧抗衡的工具——夜深人静的钟声,恰好弥补了人们心灵的空缺,满足了人们随钟声产生遐想的需求。于是“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

① 于毅《中国古钟史话》第1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

② 同上书,第4页。



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①,“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②,便成为了祖先们表达意愿的最好方式和办法。其目的在于让那声声入耳的钟声,将美好的愿望一并带入人的心灵深处,让这种美好的祈望,与苍穹融为一体。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得很明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幽起鬼神之敬。”因为钟是“金乐之首”,悦耳的钟声便随着祖先们进一步的想象,由自然的威严转变为头人、宗族领袖及国家君主的威严,成为现实生活中君临天下,召唤群臣的政治手段和形式,原始意义和演变后引申的人文价值,使其成为礼乐教化的重要手段^③。

在人类创造的发声器物中,钟声以单击发声宏亮,持续时间较长,音域变化丰富而受到人们的钟爱。对音质纯净、音域变化的追求,为先民们多样性铸钟奠定了基础。于是在钟的家族中,依据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 and 不同音质追求的各种类别款式的钟相继产生。殷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的黑暗和沉溺歌舞的世风,为我们今天诠释古代钟及钟声找到了最为合适和最为合理的注脚。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诸国的纷争和形成的多元文化,产生了镛、铎、铙、钲等不同样式的古钟。从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中期底边口弧形,顶端拥有一个长棒的甬钟,到挂钮呈“门”字形的钮钟,再到单独使用,底口平,纽具纹兽的“门”字形钲钟,这些千姿百态的古钟使我们看到了祖先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④。

甬钟、钲钟和钮钟是编钟的三种主要形制,也是青铜编钟发展衍变的主线。青铜编钟是反映中国地域文明演进过程的一类典型器物,其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发生的,古往今来,青铜编钟的铸制与应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青铜编钟的研究,宋代

① 杨天宇《周礼译注》第3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②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译》第321页,岳麓书社,2000年。

③ 于铎《中国古钟史话》第6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

④ 同上书,第25页。

以前是以对经史文献的疏证为主的,由于史世动乱、朝代更替经常发生,致使青铜编钟的铸制技术与使用制度时有遗失,后世常依据《周礼》及《考工记》的有关记载,来进行钟制研究和实践应用。宋代至清代,青铜编钟研究主要限于金石学研究范畴,金石学著作纷纷问世,其中著录的青铜编钟实物及评述为研究、制作和应用青铜编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编钟出现在商代,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自宋以来渐渐衰退^①。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打击乐器,因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所以被称为“歌钟”。它是依钟的大小不同而有次序地悬挂在木制钟架上,用木槌敲击发音,音色清脆、悠扬、穿透力强。古代编钟常用于宫廷雅乐,每逢征战、宴会、祭祀,都要演奏编钟。它可以独奏、合奏或为歌唱、舞蹈伴奏。古时,编钟是统治者专用的乐器,也是名分、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只有在天子、诸侯行礼作乐时方能使用,即“钟鸣鼎食”。

中国的编钟,是针对我们讨论的“圆形钟”而言的。编钟因其“皆扁如合瓦”故又称“扁钟”,即编钟的肩部(古称“舞”的位置),形如中国传统屋瓦的两片合形。此外,编钟因为组合“成编”故又有编钟意。

编钟各部有其固定的称呼:上半部分称“钲”,钟壳体外表有阴刻花纹和圆钟乳,又称钟枚。钟体下部称“鼓”,即撞击发音的位置。钟口弧形弯曲,称“曲于”,古又称为“于”。钟体内壁高低不平,甚至有深沟槽,均为调音磨铍所致。编钟以斜形悬挂而牢固,置法与圆形钟有明显不同。

由于编钟特有的形状与结构,造成了它不同于圆形钟的独特发声特性。圆形钟声音宏亮、悠长;而编钟的钟口弯曲,钟体表面铸以钟乳,以其声音较快衰减并拥有双音为特点。这种对声音效果的不同追求,最终导致圆形钟以娱神、编钟以娱人为目的的两个钟的世界^②。

铃,一种摇奏体鸣乐器,《说文》解释为“令丁也”,“令丁”即铃铛。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上“谓其声令丁然也”,是解释“铃”得名的由来;《广韵》称

① 于弢《中国古钟史话》第25、102、103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

② 同上书,第62-63页。



“铃，似钟而小”，是解释“铃的形制”。在先秦的文献里，关于铃的记载很少，年代也较晚。从考古发现来看，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后期，距今约6000年。而出土的大都为车马铃和装饰铃，地点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仰韶、大汶口和龙山等地。“铃”与“钟”的自鸣与助鸣不仅使二者在名称上区别开来，更造就了“钟”以后所包含的许多“人为”的社会因素。在理论界，有学者认为中国铜钟起源于铜铃，并认为铃与钟之间具有共同的形状特点，即“钟侧有扉棱，钟于或平或曲，横截面为椭圆”^①。

中国“钟”起源于何时，现存史籍记载不一。《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孙伯岐生鼓延，是始为钟。”《吕氏春秋·仲夏纪》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又说：“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还说：“钟始于黄帝。”^②《管子·五形篇》：“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味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礼记》卷三十一《明堂位第十四》则说：“垂”是传说中尧的铸钟工匠。所以郑玄曰：“垂，尧之共工也。”孔颖达疏：“垂之和钟者，垂之所作调和之钟。”远古传说的多样性，在今天已难以考查。但是，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为论证中国古钟的起源提供了可靠依据。

上古时期的古钟，因受制作材料的限制，很难有其固定的音阶关系。作为没有音阶关系和音阶概念的一种响器的“钟”，它的作用应当是氏族群体部落发出某种信息，是人类模拟自然或自身的一种伟大创造。

到了商代，具有一定音阶关系的铜钟已经产生^③。

秦汉以后，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铸钟工匠及乐工散亡，成为铸钟业起落兴衰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各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广泛发展，从而使得笨重的编钟，在众多的外来乐器面前，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加上编钟制造耗资巨大，民间既无财力，又无演奏

① 于镏《中国古钟史话》第88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

② 见《吕氏春秋·仲夏纪》。

③ 戴念祖《中国声学史》第4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条件,且调音困难,不易搬动,只能在宫廷演奏,这就决定了编钟只能远离民众,成为宫廷贵族享用的乐器。铸钟技术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失传的史实,就成为诠释这段历史最好的注脚。

最原始的中国古钟,其形制与中空都是以“合瓦形”而存在的。中国古钟形制的丰富多彩,是随着考古的发现和世传遗留的征集,而为人们逐步认识到的。从审美意义上来说,形制丰富代表着先人们所处的那个年代、那一地区的审美习惯,当时君主、帝王的喜好,以及铸造技术等诸多因素及其包含的内容。形制丰富的关键,在于先人对钟的发声方法变化的追求。在所检索的古文献中,大量因钟的发声方法不符合造钟人的意图,或因钟律不符合祖制,而将铸造好的钟销毁的记载,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形制丰富多样古钟的遗留,不仅仅体现了铸造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有形的古钟当中体察到无形的钟声和钟律的变化^①。

西周是奴隶制鼎盛、统治经验更加成熟的王朝,“宫廷雅乐”即诞生在周公姬旦摄政的时代里。

当时的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即所谓“八音”。然而多数还是敲击乐器,最突出的则是成系列悬挂在架上的编钟和编磬。可以说,“宫廷雅乐”是以特钟、编钟能奏出“金石之声”,并能决定雅乐的调性和旋而得名的^②。

从考古发现的编钟常常出现在先秦时期的贵族墓中这一史实来看,雅乐的乐器是以编钟为主要群体的发声器。而俗乐中由于编钟自身诸多因素的影响,仅能以特钟或圆形钟的形式逐步形成自己的系统。雅乐使钟具有了高贵的身份,但却葬送了钟进一步发展的前途^③。

盛唐气象是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文化领域独有的现象,对钟及钟声的追求,在盛唐诗歌中有集中丰富的体现,钟及钟声起到了迎合、启发、呼唤盛唐追求博大精神的作用。据《晚唐钟声》一书介绍:“《全唐诗》(含《外编》)中具有钟声意义的语词共出现 1206 次。”共有二百八十多位诗人写到钟声,而

① 见于弢《中国古钟史话》第 112 - 121 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 年。

② 同上书,第 132 - 133 页。

③ 同上书,第 136 页。



像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更是无一不写到过钟声。从杜甫的“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到“前庭列钟鼓,广殿延群臣”,以及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等大量描写钟及钟声的诗句可以看出,钟及钟声在盛唐之时已将作为娱人乐器的成分远远地抛开,超越了一般性的文化意义。盛唐时期,以钟声(不是乐声)单一的声响来作为寓意和歌颂太平盛世、万民乐业的景象,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不多见的。盛唐诗歌当中对钟及钟声的描写,不管是君主对自身优越地位的惬意比喻,还是庶民对升平歌舞的欢欣,都是在钟及钟声具有了独特社会地位和固有观念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寥亮来丰岭,分明辨古钟。”“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古刹疏钟度,遥风破月悬。”盛唐气象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对佛学的包容,钟由此一步步迈入人类灵魂的领域,从而使得钟及钟声在唐诗中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并通过这些盛唐诗歌而得以保留^①。

“钟”入佛门以后,便有了梵钟与唤钟之分。“梵”者,古印度语音译,即表示远离尘世,处清净之地之义。这是“佛”来自印度抹不去的印记,也是“钟”进入中国佛门后留下的最为明显的外来文化烙印。此外,进入佛门的“钟”还可称“大钟”、“钓钟”、“撞钟”、“洪钟”和“鲸钟”等。佛门中如此接近世俗的丰富的对钟的称呼,让人窥探到佛与凡夫俗子之间那无比的贴近^②。

钟以后越来越受寺庙的重视,因此,钟置于寺庙何种位置便成为寺庙的一个重要课题,以至于发展到凡有钟者均建钟楼的做法。钟楼通常是与鼓楼分居伽蓝的两翼,钟楼则建于东面,是寺院庙宇的七堂之一。

自从寺庙有钟后,寺内一切皆由钟定。

《百丈清规》卷下大众章日用轨范条:禅门补更五点,(午后十时)稍后,首由“辰司”报告时刻,继由“堂行”于堂前敲板三通,“钟司”随后便鸣钟十八声,以报坐禅终了。此十八声钟后,和尚方才可以开被安枕就寝。因此这十八声响,又称开枕钟、十八钟、定钟、初夜钟^③。

① 于弢《中国古钟史话》第137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

② 同上书,第139页。

③ 同上书,第141页。

三、关于磬

石磬是我国古老的打击乐器,早在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早期,石磬就已经发展成了固定的敲击发声的响器了。《诗经·商颂》中就有“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的诗句。迄今为止,据考古资料统计,石磬多出土于中原地区。磬是一种石制体鸣击奏乐器,在我国古代有着重要地位,一度构筑起先秦时期金石之乐的光辉,成为历代统治阶级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发现某些能发出乐音的板状石器,并逐渐将其发展为磬,运用于生活之中。由于其制作材料易寻觅,因此可以大量制造,并在各种礼乐场合使用。

磬字在甲骨文里的形状很像人手持槌以击悬石。《周礼·春官·磬师》:“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可见磬与编钟的差异在古人的概念中是十分清晰的。因磬是石质制成的,所以“磬”从“石”,《说文》称“磬,石乐也”。磬又称“玉磬”,如《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磬”的形状类似矩尺,宽而短的一端称“股”,狭而长的一端称“鼓”,中间有孔,悬于架上。“磬”与“钟”一样,单独悬挂的称之为“特磬”,单个特磬作为氏族“鸣以聚众”的信号乐器,也是皇帝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演奏的乐器。《律吕精义》:“夫悬一钟一磬者,谓特急之钟磬。”所不同的是,“特磬”多是用以定音的。大小不同的磬编组悬于一架上的称“编磬”,它的出现是在商代晚期^①。编磬挂在木架上演奏,主要用于宫廷音乐。在举办宗庙祭祀、宗族盛宴等大典时与编钟合奏。磬的形制在《考工记·磬式》中有详细记载:“磬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参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崑。”

在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磬曾被称为“鸣球”。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劳动之后敲击着石头,装扮成各种野兽的形象跳舞娱乐。这种敲击的石头就很有可能被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打击乐器磬。从“黄帝使伶伦造磬”以来,取片状石材制成曲尺形,上钻磨一孔,悬挂敲击(其造型又酷似古人在宗庙祭祀、

^① 于弢《中国古钟史话》第94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